

“背子”是早期移民的发明

泸定存世姓氏《宗谱》、《家谱》记载，溯源其始祖来历，发现“进山落业”的祖先渠道有三：一是“湖广（旧时湖北、湖南统称）填四川”“孝感”的移民；二是“山西洪桐大槐树”北方灾民；三是川西进山的“背夫”、“兵勇”、“小贩”、“工匠”和流民。

这些在原籍平坝、平原用扁担挑箩兜、推独轮车、赶木轮马车、驮驮运输方式的早期移民，到了泸定面对大渡河谷开门见山、出门爬坡过坎、崎岖不平且只有人的脚步可以行走的山路，老的一套运输方式“不服水土”。

环境改变人，为适宜山路运输，吃苦耐劳的先辈们独创适应崎岖山路的一种运输方式：“背子”，于是应运而生各种“背子”工具。常见“背子”工具有：“背夹子”，与之配套歇气的“丁”字木拐；背兜，背兜分糠背（大号）、牛粪背（中号）、细篾精致的家背；耐背的“牛皮条”、不勒膀子“麻辫”、简便的麻绳、棕绳。

不同的“背子”（货物）使用不同的背具。背运藏茶、粮食、油、酒、篓子、边猪、腊肉、烧柴、背人、砖、瓦等用背夹子。背长途、负重150斤以上的叫“硬背子”。

背抛货，背较轻的“背子”，这种背子叫“软背子”。人的第一技能是模仿。农家孩子从小见大人背“背子”长大。三四岁时，吵着模仿大人要“背”，便有了最初儿时背“布娃娃”的游戏。长到七八岁时，家长请篾匠量身竹编“小背兜”学背“背子”。几年后，孩子跟随大人上山背烧柴、背粮食、背药材、背石灰、背砖瓦、背茄瓜小菜、花生、核桃，成为父母的帮手。进入青年，背力背功渐长，能负重一二百斤，加入成年“背子”队伍。有的到了壮年，负重三四百斤（旧秤16两为1斤）挣得某“大劲”称号。



康巴周末

康藏人文

2020年7月1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唐闻 组版：格扎

见 | 证 | 甘 | 孜 |

州文联主动作为推精品

张贵华

州文联主动作为，找准坐标，发挥自身优势，结合文联工作实际，围绕“三个抓好”“三个办实”工作主线，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州委书记刘成鸣在全州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专题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一是抓好政治引领工作。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文联工作始终，加强文联机关和州各文艺家协会的政治理论学习，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全体干部职工和广大文艺工作者听党话、跟党走决心和信念。

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工作，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严把贡嘎山杂志社、汉两个刊物的政治关，真正把刊物办成党的思想政治引领阵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窗口。

二是抓好精品力作创作。州文联把“出作品、出人才”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努力推出精品力作，繁荣发展甘孜州文艺事业。

积极搭建培养文艺人才的平台，加强优秀文艺人才队伍建设。通过重点创作、定点扶持的方式，支持优秀作家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开展文艺创作活动。

出版“康巴作家群”藏文作家书系8部，推出脱贫奔康长篇报告文学《理塘：巅峰之战》《画卷》《印记（暂定名）》等3部，出版交通摄影画册《雪域天路》。

推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歌《在祖国的怀抱》三种版本：成人版、流行版和儿童版。创作推出7首圣洁甘孜新歌，协助做好《横断山恋歌》的拍摄。

积极支持电影《生死搏斗》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推出文旅书籍《视觉甘孜——甘孜州风光摄影指南》《边诗钩沉》《康定川剧活动——从历史的记忆中走来》《康巴民居》。协助拍摄推出《甘孜：3000米以上》系列短视频等。

三是抓好文化品牌打造。以格萨尔王进入四川第二批历史名人为契机，积极做好格萨尔文化的挖掘、保护、传承、创新工作。组织民间文艺家深入基层，挖掘整理格萨尔历史遗迹、传说故事等，推出格萨尔主题新歌。

四是办好央央嘉措诗歌节。通力配合理塘县委、县政府办好第四届“四川·理塘央央嘉措诗歌节”，邀请名家参加诗歌节系列活动，办好诗歌节高峰论坛，全力打造“央央嘉措诗歌节”品牌，努力提升甘孜州的美誉度和知名度。

五是办好建州70周年摄影美术书法作品展。办好“雪域天路——从交通看甘孜州建州70年的变化”摄影展，展示甘孜交通发展特别是实施交通先行战略的生动实践。

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筹备举办美术书法作品展，全面展示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全州各族人民同甘共苦，全面实现从“一步跨千年”走向“同步全面小康”的历史性变革。

六是办好民族文学改稿班。与《民族文学》在康定联合举办藏文改稿班，组织甘孜州藏文作家和藏文文学爱好者进行集中培训，努力提高藏文文学创作水平。与甘孜县合作开展采风创作活动，发挥“名家效应”，提升甘孜州对外的影响力，全力助推全域旅游发展。

总的来说，不管画家是什么民族？不管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和技法？只要他们的作品继承了西藏传统审美、植根于藏文化这块沃土中，无论外在形貌如何转变，都是西藏精神、西藏文化和西藏审美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化身”而已。这也成为界定一幅绘画作品是否属于“西藏绘画”的二不法门。

6

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上接第五版)

肆忆

1949年春，康定日库寺活佛因病专程到成都治疗，后来又回到眉山住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听说康定已经解放，于是1950年6月，决定返回康定，6月19日途经雅安，日库活佛专程去拜见了中共西康区委书记廖志高，向廖书记表达了一个佛教界人士对人民解放军来到西康的欢迎。廖书记十分高兴，向日库活佛介绍了康区最新的情况，廖书记说：现在决定在康区实行区域自治，首先决定将金沙江以东到康定这一区域成立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自治区的名称问题，根据各方的意见，已经有了一些方案，但还没有定下来，想听听活佛的意见。于是廖书记将已有的几个名字，向日库活佛作了介绍，当时进入比选的方案有：西康省康区藏族自治区；西康省康

东博巴自治区；西康省康东康巴自治区；西康省康东自治区等。日库活佛听了廖书记介绍，也说了自己个人的一些建议，他说：对于康区区域自治的名称问题，我觉得可以用西康省下康自治区，因藏族一般是指西藏，对西康界限不明显，至于“博巴”则包括得更广，青海、甘肃、四川的藏族都包括在内了，假如只用康东，那以后就须得有康西、康南、康北，这些界限都不能明显划分。因此，以金沙江的西岸为上康，东岸为下康，比较适当些……。

当然这只是一次关于自治区名称问题的意见收集，但从这次对话中不难看出当时从中央到省、地的各级领导，对新中国建立后成立的第一个地区级少数民族自治政权的高度重视。

伍忆

中共西康区党委《关于东藏建立人民政府的布署》上报党中央后，毛主席见到了这份文件，其中关于名称问题，引起了主席的高度重视，他从全国的大局出发，在这份文件上签下了一段极为重要的批示，可以说正是这段批示，指引了后来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全面实施的道路。主席在批示中指出：“区域自治问题牵涉很广，有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甘肃、西康、云南、广西、贵州、海南、湘西等处，有的须成立内蒙那样的大区政府，有的须成立包括几个

县的小区政府，有的是一个县或一个区的政府，疆域划分、人员配备、政策指导，问题甚多，须加统筹。此电所称东藏自治区是与西康省政府并立的，还是属于西康省之内的？其疆域如何？是否事前得到中央批准？请维汉（注，李维汉）查告，或去电询问。”主席签下这段批示的时间是1950年9月16日，距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成立只有2个多月的时间了，但正是这段批示指引了后来全国少数民族自治政权建立实行区、州、县不同层级的正确道路。

陆忆

1950年11月17日，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在康定隆重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各族各界代表共计271人，从这次代表会的报到册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代表会的代表构成是十分全面和考究的。从地域上讲，当时康区所属的各个县均有代表参加；从性别上看，男性代表为多数，有259人，但仍然有12名女性代表。这在当时那样封闭落后、男权至上的康区，有12名女性参加会议，已然是十分亮丽的一点了；从民族结构来看，这次大会藏族代表180人，占代表人数的大多数，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时也有彝族代表12人，回族代表5人，这就体现了当时筹办方对民族政策把握的周详；从界别上讲，这次会议不仅有党政、军代表，还专门邀请了农民代表、牧民代表、工会代表、妇女代表、青年团代表、学生代表、工商业代表、医药界代表、文艺界代表、宗教界代表等等，而且在宗教界代表中分别考虑了藏传佛教五大教派的代表人士。

夏克刀登成了排位第一的副主席，苗逢澍成了排位第二的副主席。这份名单当时还未上报，还在康定，分析只有苗逢澍本人有权改动。后来经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康省批下来进行选举的名单没有一个字的更改，从这一细节中我们不难看出共产党人对藏族和藏族人民的真诚，也充分体现了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1950年11月24日，一个永远记入历史的一天，这一天，新中国第一个地区级少数民族自治政权在康定正式诞生了。

就在这一天的会闭幕式上，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可能已经被很多人遗忘，但在当天大会的主持人讲话稿中确确实实地记载了下来。

这天上午，参加大会的一位陈姓军方代表，因琐事辱骂了招待所一位招待员，此事引起了大会的高度重视，康定军分区司令部当即找他谈话，决定终止他的代表资格，而且要在大会开始前公开检讨，向招待员公开致歉。于是，在当天上午10时举行的大会闭幕式开始前，会议主持人就临时增加了这样一个议程。

1950年11月24日，新中国的第一个地区级少数民族自治政权由此踏上了新的征程。

不知是刻意为之还是巧合，这一天刚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康定整整8个月。也是从这一天开始，中国共产党一切以人民为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对一切官僚主义在新中国第一州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乾达婆之音

扎西次仁

蓝天，白云。我骑着骏马游走在坦荡的毛垭坝草原。一曲犹如云的飘逸，风的潇洒的悠悠牧歌飘然而至。

我的家乡是金色山谷，见到黄金就想起家乡；我的家乡是白螺山谷，见到白螺就想起家乡。

天高云淡，天的尽头，一位牧羊姑娘挥动“鸟朵”赶着一群羊儿。那天籁之音就是从她那里飘过来的。歌声甜美悠长，音域宽广舒展，节奏自由随意，旋律优美跌宕，有一种独特的韵味和浓郁的地方风格，给我无限的时空和坦荡的艺术感受。我似乎忘了自己身处何处，静静地陶醉在音乐之中。若干年后，当我混迹嘈杂的闹市之中时，依然忘不了那刻骨铭心的悠悠牧歌。

康巴牧歌（山歌）音高字少腔长，加之密集性的装饰音，歌声就像被风吹打的经幡，落在石头上的珍珠，成为弦律的美化和装饰，与弦律融为一体，具有一种回肠荡气，余音绕梁的艺术效果，反映出康巴人独特的艺术审美力。

康巴牧歌（山歌）音调高亢优美，演唱者讲究自然、流畅、连贯，多变而不做作，灵活而不娇纤。由于演唱者各自处理装饰音位置的不同，往往造成不同的艺术效果和不同的审美意境。如出现在长音之前，有一种悠远飘逸之感，仿佛那变化无穷的江河；如出现在长音之后，更觉开阔、坦荡、豁达，仿佛置身草原，仰望轻盈的白云，放眼起伏的群山，让人进入一种空灵飘渺，物我一体的境界。



转山转水。刘鸿摄

唐 | 卡 | 散 | 叙 |

西藏绘画综述

刘忠俊

从根敦群培到安多强巴，从“甘孜藏画”到“布面重彩”，正是西藏绘画从传统走向现代、由宗教绘画转向纯艺术绘画的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根敦群培完成了第一步，他把西方绘画引入西藏人的视野；安多强巴完成了第二步，他把写实主义带入了西藏传统唐卡绘画；“甘孜藏画”则完成了第三步，将写现实主义绘画与传统唐卡巧妙融合，气韵生动，而“布面重彩”虽然登场时间较晚，但它是在画面的形式和语言上完成了传统与当代的统一，还将西藏的审美特质虹化为作品的精神内核！从而成为西藏绘画发展的坐标。而承载着安多人厚实稚拙的“样巴版画”，则是藏族画家在版画领域开拓出的一方新天地。

（一）画家的民族身份

青藏高原上生活着以藏族民族为主体，兼有珞巴、门巴、汉、回、纳西、白族等不同民族。西藏文化也可以说是以藏族文化为绝对主体，但是否“西藏绘画”就等同于“藏族人的绘画”？画家的民族身份是否与作品的文化定位有直接关系？在笔者看来，尽管绝大多数西藏绘画都是藏族画家创作的，但二者之间并非绝对的关系。

举例来说，根敦群培当年画的作品，有很多都属于水彩画。包括现在也有很多藏族画家在从事油画、国画创作，他们创作的作品，

可能仍旧属于各个不同的画种体系，并没有“西藏绘画”文化传承。

另外一方面，从古至今西藏绘画都是在对周边民族文化不断学习和交流中发展的。例如，在公元7—11世纪，印度、中原两地的艺术家多次进入雪域高原，与吐蕃艺术家一起开创了前、后弘期美术的繁盛。到了公元13世纪，尼泊尔的尼瓦尔族艺人大量进入西藏，为萨迦寺、夏鲁寺等地的绘画做出了突出贡献。留存于藏族美术史中的画家，有著名的“巧工天”阿尼哥[阿尼哥(Anigo, 1244—1306)，建筑师，元朝雕塑家，工艺美术家，尼泊尔人，为王室后裔。除了绘制唐卡以外，还设计建造有萨迦金塔、北京妙应寺白塔、五台山白塔等等]，也有在敦煌做双向交流的白央[白央，在敦煌和汉族画家合作唐卡《释迦牟尼与二菩萨》的吐蕃画家]等人，还有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各族艺术家加入，才让西藏美术如此多精彩灿烂。

到了现代，“甘孜藏画”和“布面重彩”乃至“样巴版画”等创作组都是由藏、汉各民族画家组成的。特别是“甘孜藏画”创作组的核心创作人物就有来自内地的汉族画家梅定开、陈秉奎等。而西藏“布面重彩”的代表性画家也是来自内地的韩书力和余友心。他们都是透彻西藏化的汉族画家。他们长期浸淫于藏文化的汪洋

大海，与这里山川大地、神佛生民朝夕相伴，如醉如痴，涤魂净心，虽久历风霜暑寒而情怀依旧。因此，画家的民族性并不是“确定其作品是否为西藏绘画”的必然条件。

（二）材料的变化

传统唐卡绘画选择的是矿物颜料和画布、绢本等，即便在绘制壁画时，虽然基底由画布改为了墙壁，也未改变“平涂勾染”的胶彩绘制技法。后来的“甘孜藏画”和“布面重彩”也都沿用了这种胶彩技法。那么是否西藏绘画都得是胶彩呢？这也不一定，比如画家计美赤烈、阿旺扎巴等，他们很多作品都是用油画材料来创作的，而这些作品由于具备了西藏的文化特质和审美习惯，所以仍旧属于“西藏绘画”。

同样，易西嘉洋创作的样巴版画，是在藏纸上采用类似木版粉印的技法；此外，他还尝试用油画材料来绘制唐卡。这些材料和传统绘画手法相去甚远，但并不影响其作品对藏文化的传承。

总的来说，不管画家是什么民族？不管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和技法？只要他们的作品继承了西藏传统审美、植根于藏文化这块沃土中，无论外在形貌如何转变，都是西藏精神、西藏文化和西藏审美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化身”而已。这也成为界定一幅绘画作品是否属于“西藏绘画”的二不法门。

五色海

第928期